

# 第 1 章 中国发展对外贸易的基本理论

## 学习目标

了解新中国贸易思想和我国对外开放的发展概况以及改革开放后我国对国际贸易理论的探讨；掌握我国发展对外贸易的理论基础；重点掌握我国对外开放政策的内涵和对外贸易发展战略。

### 1.1 新中国贸易思想发展的总体描述

总体上说，与历史上的许多时期相比，新中国贸易思想的发展达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但五十多年的发展极不平衡：1949—1965 年为新中国贸易思想初步发展时期，1966—1978 年为新中国贸易思想停滞发展时期，1979 年以来为新中国贸易思想全面发展时期。三个时期在研究内容和发展水平上各不相同，但从时序结构看，又是 50 年贸易思想曲折发展的相互联系的三个组成部分。其中第一时期和第二时期同属于计划经济时期，也可统称为改革开放前时期；第三时期是开始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探索直至理论上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也称为改革开放以来的理论发展时期。以邓小平南巡讲话为界，第三时期又可细分为两个阶段。

## 1949—1965 年贸易思想初步发展时期

1949—1965 年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确立和着手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时期，这一时期贸易思想的发展状况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建国初期，我国贸易经济研究的理论基础很薄弱，既对马克思主义贸易理论缺乏深入系统的研究和认识，也对西方贸易理论缺乏充分的介绍和分析。

(2) 这一时期的贸易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前苏联贸易理论的影响，许多贸易理论著作，特别是大专院校有关教材的体系设计，基本是以前苏联有关教科书为蓝本的。其中较为突出的如有关社会主义国内商品交换的认识，大多数学者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全民所有制企业之间的交换虽然具有某些商品交换的特点，但已不属于商品交换范畴。

(3) 我国经济理论工作者对贸易理论和实践中许多问题的初步研究，内容涉及社会主义价格形成的基础、工农业之间的交换关系、商品流通渠道、物价方针、农产品购销、生产资料购销等诸多方面，并提出了一些对后来的贸易理论和实践产生重大影响观点，如：对外经济贸易活动以“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国内市场为主，对外贸易为辅”的总方针；有关社会主义统一市场的论述等。

(4) 从贸易经济学学科的建设来看，在引进苏联有关教学和理论体系的基础上，许多学者开始了我国国内贸易或商业经济理论体系的建设工作，逐步建立了“商业经济学”和“商业组织与技术”两门国内贸易经济领域的核心学科，逐步完成了国内贸易经济理论体系的构建工作。其中值得一提的是 1962 年由中国人民大学贸易经济教研室编写的《社会主义商业经济》一书，是国内最早公开出版的社会主义商业经济学著作之一，其结构、体系

乃至观点对以后二十多年我国国内贸易经济学理论学科的建立和发展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5) 这一时期的前期，理论研究具有学术气氛活跃、学术争论活跃的特点。当时国内主要的经济理论刊物《经济研究》登载了多篇有关贸易理论和实践的争鸣性文章。这种探索和争鸣对于深化研究贸易思想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但是从 20 世纪 50 年代末期起的随后几年内，由于过于强调阶级斗争、急于实现大跃进等一系列指导思想上的错误，学术研究的科学性、严肃性受到很大冲击，学术探讨的活跃局面也逐渐消失了。

(6) 国内贸易与国际贸易的相分离。从 20 世纪 50 年代初开始，我国的经济体制几乎全盘接受苏联模式，建立了集中的部门式体制，国内外贸易管理机构分设，与此同时，贸易人才的培养也逐步转为分开培养，由不同专业乃至不同院校承担内外贸人才的培养任务，理论研究队伍也逐步分为相互独立、很少交流的两支队伍。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才有学者明确指出这种做法的弊端，认识到国内贸易和国际贸易有着广泛的一致性和共通性。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贸易发生的基本原理是一致的，贸易活动中的若干规律也是存在共性的。有些院校开始尝试打通贸易人才培养上的“内”与“外”，实行贸易人才的通才培养。

### 1.1.2 1966—1978 年贸易思想停滞时期

“文化大革命”期间，与社会生活的其他领域一样，我国贸易经济研究也受到了极大的摧残，非但没有进一步深入发展，反而由于受到了极左思潮的影响，否定贸易理论研究中已经取得的成果，倡导某些极端错误的观点，如批判“流通决定论”，限制商品交换中的“资产阶级法权”，全盘否定国际分工，认为社会主义对外贸易是一种完全新型的对外贸易，应当与国际商品经济

关系“对着干”等，导致人们思想认识上的严重混乱，理论研究处于停滞乃至倒退的状况，这种停滞状况一直延续到 20 世纪 70 年代末。

### 1.1.3 1979 年后的大发展时期

1978 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随着人们思想认识上的解放，我国贸易经济研究进入了全面发展的时期，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改革开放的发展造就了贸易经济研究的新局面。我国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后，实践的发展迫切要求新的理论指导，而丰富的实践也为理论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在批判、反思“文化大革命”期间的错误认识的同时，对贸易经济各个领域问题的研究全面而又迅速地展开，一大批专业经济刊物的创刊，如《财贸经济》、《商业经济研究》、《国际贸易问题》、《价格理论与实践》等，为我国贸易理论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2) 理论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不断开拓。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我国贸易经济研究摆脱了过去研究主要囿于对国家领导人的有关见解和政策加以解释的状况，涉及了过去被视为禁区的各个领域，研究的视角更多地投向经济活动的内在规律，出现很多认识上的突破，如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认识，关于社会主义社会流通体制改革的认识，关于对外贸易体制改革的认识，关于对社会主义社会发展期货市场问题的认识，关于对价格运动规律的认识等。关于贸易经济活动的内在规律的认识，从一个方面对我国改革开放的顺利推进，起到了很好的指导作用。

(3) 以科学的态度对待外国贸易经济研究的成果。在建国初至“文化大革命”前，我国理论界较为注重对苏联有关论著的翻译介绍。“文化大革命”期间则由于批判崇洋媚外而极少引进国外有关的研究成果。改革开放后，我国贸易理论界再度放眼国

外，通过引进介绍国外有关成果，深化我国贸易理论和实务工作者对有关问题的认识。但与 20 世纪 50 年代和 60 年代初不同的是，这一时期改变了过去主要从苏联引进的做法，转向更为注重引进西方国家的贸易经济研究成果，介绍资本主义国家贸易实务部门的成功经验；同时改变了过去对苏联理论界的有关成果全盘接受而对西方理论的有关成果一概排斥乃至全盘否定的做法，能以辩证客观的态度分析各国的研究成果，吸取其精华之处，为丰富我国的贸易理论、指导我国的贸易实践而服务。

(4) 不断进行研究方法上的革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贸易理论界在继续运用传统的定性分析方法深化研究贸易理论和实践问题的同时，不断引入一些新的研究方法，如定量分析、边际分析、投入产出分析等。这些研究方法在贸易理论和实践问题研究中的运用，深化了人们对有关问题的认识，对推进理论发展、促进改革开放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5) 这一时期也是我国贸易经济学科快速发展的时期。在原来的商业经济、商业组织与技术等学科的基础上，通过引进国外有关成果，从原学科中分化出若干分支学科，并建立了一些新的学科，如商业企业管理、市场营销学、公共关系学、国际贸易实务、价格学、商品储运学、市场调查与预测、流通经济学、工商行政管理学、商品期货交易等。这些学科的建立大大丰富了我国贸易经济的学科体系。

(6) 从贸易思想发展轨迹来看，这一时期正是由传统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贸易思想体系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贸易思想体系转变，直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理论上得以确立以及在实践上逐步建立的重要时期。先是从反思传统计划经济体制起步，经过整个 20 世纪 80 年代认识的不断深化，为 90 年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贸易思想体系的构建提供了重要的基础。1992 年邓小平南巡讲话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

想，党的“十四大”则明确提出应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许多认识上的突破，对推进我国的对外开放和经济建设，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 1.2 我国发展对外贸易的理论基础

### 1.2.1 马克思主义的国际分工理论

国际分工是世界各国或地区之间的社会劳动分工，是各个国家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结果，是生产力发展的第一因素——科学技术作用的客观经济范畴，世界经济的历史充分证明了这一立论。

16—18 世纪是西欧各国进行资本原始积累时期。所谓资本原始积累是指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确立以前，通过暴力使小生产者同生产资料相分离，并把生产资料和货币财富集中到少数资本家手中的过程；由地理大发现所引起的对海外殖民地的掠夺和奴隶贸易也是西欧资本原始积累的重要源泉之一。在这一时期，由于各国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和生产社会化程度还比较低，以手工业和工厂手工业生产为基础的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尚未动摇自然经济的统治地位，世界市场上流通的商品主要是殖民地的热带、亚热带土特产品或奢侈品以及欧洲的手工业品，较落后的运输手段仍严重地限制了大宗商品进入国际交换领域，国际分工只是处于萌芽状态。

从 18 世纪 60 年代起，随着英国等国家大机器工业的建立，使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逐步形成。以机器技术为先导的机械化大生产不断发展，促进了生产率的迅速提高和生产规模扩大，从而使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超越出国界或区界，打破了几千年来以国家或民族为范围的自给自足的封建自然经济市场，把各种经济发展类型的国家卷入到新的世界经济大潮流之中，国际分工和生

产国际化开始形成。

19世纪70年代出现了第二次科技革命，以电力为动力的应用，如发电机、电动机、内燃机、远距离输电网等等的使用，使各种产业逐步实现了电气化，从而促进工业产业的发展，诸如化学、石油、汽车、冶金、采煤、机械制造业等工业部门的兴起和发展。到19世纪中期，欧洲各国建立起大机器工业生产，改善了交通工具，完成了产业革命，这些工业国家的工业生产各有侧重，形成了以经济部门为主的国际分工，如美国专门从事电气化生产、汽车制造和谷物生产等，德国主要从事燃料、药品等化学工业，比利时专门生产钢铁，挪威专门生产铝等等；原来是资本主义国家的食品和原料供应地的殖民地和附属国，由于科技进步以及新的生产部门的出现，工业国对殖民地的原料和产品产生了新的需求，他们还发展了燃料和其他矿产品的采掘工业。由于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加速了资本的积聚和集中，资本输出成为主要的经济特征之一，促使国际分工进一步发展，工业产品生产国与农产品、矿产品生产国之间的分工日益深化，逐步形成了国际分工体系。随着国际分工体系的形成，加强了世界各国经济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强化了各国再生产的顺利进行对国际分工的依赖性，打破了以往各个国家和民族自给自足的封建自然经济的格局。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针对当时的实际情况，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指出的：“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以电子计算机应用为核心以及空间科学技术的发展，出现了第三次科技革命。这次科技革命在50年代由美国开始，逐步扩展到西欧和日本等国家或地区，70年代以后取得了较大的发展，特别是80年

代以来出现了新高潮。新的世界科技革命的显著特点是：群体型、快速型、复合型、智能型。所谓群体型，是指它不是在个别科学理论或生产技术上获得了突破，而是在各门科学和技术领域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出现了很多新兴工业部门，如高分子合成工业、原子能工业、电子计算机工业、半导体工业、宇航工业、激光工业等。所谓快速型，是指一种科学发明与实际应用的时间大大缩短了，加快了：20世纪初大致是30年，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是18年，战后缩短到9年、7年、5年。如电话从发明到应用是56年，照相机是12年，而电视机是5年，激光是2年；从原子能的发现到第一个核电站投入生产也只有15年。所谓复合型，是指过去的科学技术革命，科学与技术两者不是一个统一的过程，而是分离的。现在是技术革命与科学革命紧密相连，即新的科学理论的创立与相应的新技术的突破往往交织在一起。同时，建立在高新技术基础上的现代生产力不仅可为科学理论提供先进的测试手段，而且能够将新的科学技术迅速应用于生产，把科学技术变为直接的生产力，形成一个科学—技术—生产的链条机制式的复合型过程。所谓智能型，是指过去科技革命的最高成就是“用机器制造机器”即机器是人手的延伸，现在是“用机器操纵机器”，即用电子计算机自动控制生产过程，不但能代替人的体力劳动，而且能代替人的脑力劳动，即机器是人脑的延伸。

新的科技革命的浪潮正冲击着整个世界，极大地影响着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将由物质生产转向知识生产。这是由于微电子和信息工业的迅速发展，属于技术、信息和智能的所谓“软件”已成为一种新型的商品。发达国家之间的软件贸易的比重将不断上升，传统商品贸易的比重将下降。

(2) 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分工和进出口商品结构上将发生变化。这是因为发达国家的劳动力将加速集中于技术和知

识密集型产业和服务业，而把一些传统工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从而引起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分工和进出口商品结构上的变化。同时，某些劳动密集型产业通过使用新技术（如智能机器人）而不再需要花费大量劳动力，从而使“劳动密集型”这个概念发生变化，发展中国家拥有廉价劳动力多的优势将会丧失。

(3) 新产品将不断涌现，产业结构和消费结构将发生急剧变化。这是由于微电子和新型材料的发展和广泛使用，将促使产品升级换代，产品生命周期将进一步缩短，新产品必将涌现，产业结构、产品结构和消费结构都将发生急剧变化。如“软件”的市场寿命往往不超过一年；一般产品正向“轻、薄、短、小”的方向发展；健康食品、绿色食品、方便食品、快餐食品将日益受到欢迎；纺织服装将日趋流行化、个性化、自然化并倾向于一次性消费；耐用消费品将不断向高、精、尖和多功能、微型化、轻型化方向发展。各种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将集中于凝聚在产品中智能与技术含量的多少。微电子的使用将使自动化生产向小批量、多品种、多规格、系列化发展，以满足人们生活多样化的需要。

(4) 传统能源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将降低。这是由于发达国家正以极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投入节约能源和替代能源的研制工作，核能、太阳能等将得到大规模利用，以代替石油和煤炭。新兴产业大都是不需要大量消耗能源的产业，因此，传统能源石油和煤炭在国际交换中的地位必将逐步降低。

(5) 各种新型材料将广泛采用，以代替传统的原材料和紧缺的稀有金属。这是由于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进步，各种新型材料，如新型塑料、碳纤维、工业陶瓷材料以及各种复合材料等研制成功并将广泛采用，以代替传统的原材料和紧缺的稀有金属，像微电子工业、光导纤维、宇航工业等对原材料的品质要求特别高，但消耗量少，如光导纤维的发展可以大量节省铜。有的专家

预言，若干年后，超级市场上的绝大部分金属和玻璃制品将被塑料制品代替。国际市场对传统原材料如钢铁、天然橡胶、铜、铅等需求将会相对减少，而以人造品代替。

(6) 将对世界粮食、食品以及与农业生产资料有关的化肥、农药、农业机械的贸易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这是由于以生物工程为标志的生命科学的发展，它所产生的变革将比工业更深刻、更广泛。它不但将从根本上改变农业的生产技术，还将从本质上改变农业的生态环境系统。加上微电子和新材料的综合利用，将使农业全面实行工业化、现代化。农业亦将由劳动密集型产业变为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不仅可使农业产量大幅度增加，同时将大大改善食品的质量和构成。因此，必将使世界粮食、食品以及与农业有关的生产资料如化肥、农药、农业机械的贸易产生重大变化。

### 1.2.2 马克思主义的再生产理论

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理论认为，社会再生产的顺利发展，客观上要求各部类之间必须保持适当的比例关系，即生产生产资料的部类和生产消费资料的两大部类之间，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之间，农业生产内部之间，工业生产内部之间都必须保持一定的平衡比例关系。这种协调平衡的比例关系不仅在实物形态上，而且在价值形态上也要求保持适当的比例关系。但是，由于各国的生产水平、经济结构、科技条件、地理环境、资源及气候等因素的影响，各国社会总产品的实物构成，往往与扩大再生产的需要有所差距。这就必然需要通过对外贸易同别国实现实物形态的转换，即可以把生产资料转换为生活资料，把生活资料转换为生产资料，或者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内部实现转换，实行互通有无，调剂余缺，这是国内贸易所无法做到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对外贸易是国民经济的一个特殊部门。

为了简明地了解上述原理，我们可以用图 1—1 来说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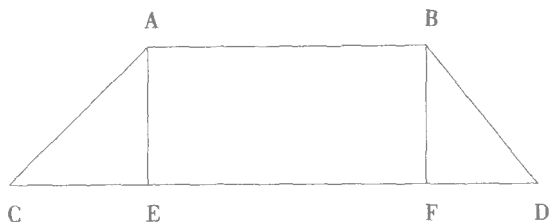


图 1—1

在图 1—1 中，AB 代表最短线经济部门产品为 1 等份，CD 代表最长线经济部门产品为 3 等份，在 AB 与 CD 之间是由短线经济部门产品、次短线经济部门产品、较短线经济部门产品……较长线经济部门产品、次长线经济部门产品、长线经济部门产品的实物形态所构成。根据社会再生产原理的要求，各部类以及每个部类的内部之间必须保持一定的比例关系，假设一国社会再生产协调平衡发展的客观要求是长线经济部门产品与短线经济部门产品的比例关系为 1:1，那么，图 1—1 中社会再生产的发展态势就会出现以下几种状况：

第一，不发展进出口贸易，国民经济的运行以短线经济部门为基础来进行。在图中以 AB 最短线生产的产品为基础，依据  $AB:EF = 1:1$  的规模进行社会再生产。显然这时的社会再生产规模是小的，而且 ACE、BFD 范围的实物得不到有效的利用，造成实物的浪费或积压，造成资金的占用或闲置。可见这种社会再生产的综合平衡模式，是封闭经济的自我循环、自我平衡的国民经济模式，不能形成规模经济，这必然阻碍社会再生产的发展。

第二，发展进出口贸易，实现实物形态的转换，以长线产品调换短线产品，达到社会再生产比例关系的协调。以图 1—2 来说明这种情况，可以以 ACE 国内所有的长线产品出口调换 BDF 短线产品进口，实现再生产比例关系的协调，使社会再生产能够

顺利进行，在图 1—2 中就表现为在  $EFD:ABH$  的规模下进行，即  $EFD:ABH = 2:2$  的再生产规模。此种情况正如前所述：通过以我所有换我所无、互通有无的贸易，可以建立一种中等水平的国民经济综合平衡，使本国的内在生产要素基本上能进入社会再生产活动，从而可以扩大再生产的规模，取得较好的国民经济效益。显然，进行这样的互通有无的对外贸易，比封闭式经济是个很大的进步。但是我们要认识到，在现代化大生产时代，以进定出，出口仅仅是为了进口，进口是为了填补国内再生产需求的空缺，这还不能充分参与和利用国际分工，发挥对外贸易作为“经济增长发动机”的效应，实现生产要素优化配置，扩大社会再生产合理规模，提高国民经济发展质量和规模效益。

第三，在当代科学技术飞跃发展，国际间经济合作进一步加强的大环境下，为了更有效地利用本国资源，充分发挥本国优势，以实现扩大社会再生产规模，客观地要求把国内外资源和国内外市场有机地结合起来，建立高起点的国民经济综合平衡，从而取得最佳的经济规模效益。如图 1—2 所示，为发挥本国经济优势，以达最佳规模经济效益之目的，可以以  $CD$  长线产品为基础进行扩大再生产。但是前面已阐述过，用  $ACE$  实物换取国外的  $BDH$  实物，这样  $GCEA$  部分已是空缺了，不可能以  $CD$  长线产品为基础进行扩大再生产，那么，怎样才能实现以  $CD$  长线产品为基础呢？有效的途径就是利用国外的资本，借用国外资本购置  $GCEA$  所需要的实物或科学技术，这样就实现了  $GCDH$  再生产规模，达到了发挥本国优势与有效地利用国外生产要素的有机结合。从扩大社会再生产原理看， $CD:GH = 3:3$ ，即社会再生产比例关系是平衡协调的，但显而易见，社会再生产规模扩大了，建立起高级的国民经济综合平衡，从而取得最佳的经济规模和最优的经济效益。



图 1—2

### 1.2.3 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价值理论

马克思在继承和发展古典国际贸易学说科学内核的基础上，应用劳动价值论去考察世界市场、分析国际贸易的运作时，创立了“国际价值”的科学理论，为各国发展对外贸易奠定了重要的理论依据。

国际价值理论指出：价值规律是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基本规律，只要存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价值规律就必然存在并发生作用。商品的价值不取决于商品生产者的个别劳动时间，而是取决于商品生产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当各国产品投向国际市场时，商品交换的国际价值就取决于国际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这样，在国际市场上，同一种商品就具有国内价值和国际价值两种根本不同的价值标准，而在国际交换时，则是以国际价值作为衡量标准。在这两种不同的价值标准之间存在着“比较差异”，即国际市场上劳动生产率高的国家可以以一天的劳动产品换取劳动生产率低的国家多于一天的劳动产品，这是价值规律在国际市场上发生不同作用的结果。在平等的贸易条件下，国际交换的双方都可能得到贸易利益，实现以较少的劳动耗费，获得较多的劳动产品。双方获得贸易利益的表现有以下几种情况：第一，交换的两国各有一种商品的国内价值低于国际价值，即各有一种商品占优势，这样，各国生产本国占优势的商品，就可以实现以较少的

社会必要劳动换取较多的国际社会必要劳动，从而得到各自的直接贸易利益。第二，交换双方中一国的两种商品的国内价值都低于国际价值，但低的程度不同；在这种情况下，该国生产最占优势的产品，可以得到更多的贸易利益。第三，交换双方中一国的两种商品的国内价值都高于国际价值，但高的程度不同；在这种情况下，该国如生产两种劣势产品中相对优势的产品，也可以获取一定的相对贸易利益，即获得间接利益。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即使经济技术比较落后、劳动生产率比较低的国家，在国际交换中，它们“所付出的实物形态的物化劳动多于它所得到的，但是它由此得到的商品比它自己所能生产的更便宜”<sup>①</sup>，从而节约社会劳动，获得经济利益。这就是说，经济技术落后、劳动生产率低的国家，在对外贸易中，它所出口的商品是亏损的，但是，通过出口获得外汇，再进口比自己生产更有利的产品，或者自己根本没有的产品和技术设备，这同样可以节约社会劳动。用这种节约下来的劳动，在国内安排其他产品的生产，从而获得新产品，就可以增加使用价值量，同时也可以增加价值量。这就是马克思从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相互关系中，来论述国际交换增加一国价值总量的问题。马克思说：“我可以用新价值创造新劳动，从而创造新价值，我一次又一次地再生产价值，再用来和新价值交换。我可以把本来没有价值的东西，当作交换对象，从而增殖价值。”<sup>②</sup>显然，马克思在这里说的是通过国际交换，节约社会劳动，获得更多的新价值。一国只要参加国际分工和国际交换，就能够发挥本国的绝对优势或相对优势，从而使本国的社会劳动更有效地发挥作用，使一国由此所节约的社会劳动创造出追加的价值。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同样存在着交换

<sup>①</sup>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36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

<sup>②</sup>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第5分册，6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

双方互利的条件和可能性。

#### 1.2.4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其内容十分丰富。根据邓小平同志的一系列重要论述以及我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经验，党的“十三大”、十三届七中全会和江泽民同志在建党七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曾从不同角度作过阐述和概括。“十四大”报告在过去阐述的基础上，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基本组成方面，即从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步骤、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祖国统一等方面进行了新的更高的概括。

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主旋律，这为我国发展社会主义对外贸易提供了极好的机遇，我们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为我国现代化建设争取有利的国际环境。同时，在这个世界主旋律下，国际竞争的实质，就是以经济和科技实力为基础的综合国力的较量；在这种形势下，必然要求我们实行对外开放，扩大对外贸易，取人之长，补己之短，加速发展社会主义。

在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问题上，认为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对我国国情的正确估计，也就是说，我国的社会主义是一种尚未成熟的制度，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还带有他所脱胎出来的那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痕迹。这就必然要求我们逐步摆脱贫穷、摆脱离落后的状态，要由农业人口占多数的手工劳动为基础的农业国逐步变为非农业人口占多数的现代化工业国；由自然经济、半封建经济占很大比重变为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社会。在我国人口多、底子薄，生产力发展水平低，科技水平不高的实际情况下，我们必须发展国内市场和国外市场，利用国内

外两种资源，大力发展对外贸易；必须要通过改革和探索，建立和发展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对外贸易体制，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实现中华民族的振兴。

### 1.3 1978 年后主要对外贸易理论的探讨

#### 1.3.1 关于比较优势理论的探讨

比较优势理论是英国古典学派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在 19 世纪初创建的国际贸易理论，围绕这一理论的世界性争论历经百多年而不衰。西方的争论主要是如何补充、修正和发展它；苏联、东欧国家的争论焦点在于这一理论的合理性、可利用性如何；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争论集中于是否损害发展中国家利益。在文化大革命前，我国对该理论持全盘否定态度，斥之为伪科学、反动理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对外开放的社会主义实践要以经济利益为中心来发展对外贸易、利用国际市场，对“比较成本说”的重新认识问题被提了出来，引起了经济和贸易理论研究工作者的重视。

袁文祺、戴伦彰、王林生在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创刊号（1980）上的论文《国际分工与我国的对外经济关系》中，首先明确提出，大卫·李嘉图的比较成本说有其“合理内核”而且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充分利用国际分工”，不应该把对外贸易只作为调剂国民经济“填空补缺”的手段。这篇文章在全国对外经济贸易理论界引起了广泛的反响，使关于比较利益学说的探讨很快成为我国发展对外经济关系的基础理论研究的重要方面，揭开对此及国际价值、国际分工等相关问题的热烈而持久的学术争鸣的序幕。这是建国以来第一次就有关我国对外经济关系问题展开的大规模学术讨论。对“比较成本说”的研究，既是一个学术问题，又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它对于深入了解问题、推动学术进

步、开展对外经济活动具有重大意义。

讨论大致分成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20世纪80年代前期的争论

(1) 比较优势理论是否具有合理的内核

否定态度

A. 比较优势理论的许多假设和前提都是资本主义或市场经济性质的，是为资产阶级自由贸易服务的，在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进行的交换往往不是互利的。

B. 马克思反对比较利益，他在《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中清楚地指出“怪不得自由贸易信徒并不懂得一国如何牺牲别国而致富”。

C. 发达国家从未完全实行自由贸易，19世纪后期，发达国家纷纷实行保护贸易而加快了经济发展，破灭了以比较优势理论为基础的自由贸易神话。

D. 用该理论指导发展中国家对外贸易将十分有害。姚曾荫发表于《国际贸易问题》上的论文“正确执行对外开放政策”中认为，“按照比较成本说进行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发展中国家就会专门从事初级产品的生产”，“如果要使民族工业发展起来，就必须抛弃比较成本—自由贸易的原则，实行保护贸易政策”。

肯定态度

A. 李湘发表于《国际贸易论文选》（1982）上的论文“比较成本学说及其现实意义”中认为，“比较成本说论述的是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发展的必然性；它所揭示的社会分工的扩展——从社会分工到国际分工，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经济规律，所以它是科学的理论”。

B. 王林生：发表于《国际贸易论文选》（1982）上的论文“关于对李嘉图比较成本说的评价问题”中认为，“评价一种理论的科学价值和历史意义，主要看它是否有利于生产力的发